

大学的
韦伯、海



精神
社会学

学人文丛

金耀基 自选集

大学的世界精神

韦伯、海德堡、社会学

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

全球化与大学教育的国际维度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金耀基
自选集

金耀基 著

策划 许纪霖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耀基自选集 / 金耀基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6

(学人文丛)

ISBN 7-5320-7881-7

I. 金... II. 金... III. ①金耀基—文集②社会学—中国—文集③现代化建设—中国—文集
IV. C91-53②D6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42811号

学 人 文 丛

金耀基自选集

金耀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易文网: www.ewen.cc

各地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64,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7881-7/I·6 定价: 21.00 元

自序

这是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四本书，也是第一本“自选集”。

因为要出“自选集”，才发现自己选自己的文章并不是件易事，其实我倒没有文字自恋结，以为自己所发表的文章都可“入选”，值得一印再印的。毕竟我写过不算少的文字，出过不算太少的书，而自己真正不喜欢，甚至自责自悔的文章倒还真的没有，但“自选集”有篇幅规限，就依编辑先生建议把“自选集”分为：“中国的现代化”、“个人与社会”、“社会学与现代中国”与“大学的理念”四个单元。每个单元选四至五篇文字，看来颇平衡，对自己有了交代，虽然并没有收入我很喜欢的几篇。“自选集”的附录是侯军先生对我的“访问”，实际上可看作是我们两人的“对话”。

“自选集”定了稿，对十八篇文字作了一些分析，我发现从时间上看，最近一篇是一年前写的，最早一篇则距今已三十六年矣。至于这些文字原初发表的地方，最多的是香港，其次是台湾，近年有几篇则是大陆。这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社会是我出生、成长和工作的三个地方，尽管美国、欧洲在我学思生涯中是个无可或忘的空间，我总觉得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字

书写是件最自得的事。一九四九年离别出生的大陆迄今已是半个世纪了,一九八五年后,返“乡”多次,但点水蜻蜓,都是短暂的照面,依然有似曾相识的陌生。这个“自选集”的出版,算是“另一类”游子回乡的定居。

在这个“自选集”即将付印之际,我不能不重重感谢许纪霖先生,他为本书出版花了很多精力与时间,特别应一提的是,最初有几篇文字是经他“法眼”验审而知趣退选的,避免了可能出现“不合事宜”的尴尬。当然,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章毅先生在编辑上的建议也是我十分铭感的。是为序。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

目录

自序	1
----------	---

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	1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	38
——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	
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	68
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76
——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	

个人与社会

关系和网络的建构	93
——一个社会学的诠释	
“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	117
中国人的“公”、“私”观念	141
——兼论中国人对隐私权的理解	
个人与社会	157
——儒家伦理范典的特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问题	

社会学与现代中国

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	175
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	202

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	224
韦伯、海德堡、社会学	244
儒家伦理、社会学与政治秩序	261

——序张德胜著《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

大学的理念

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与学术伦理	271
大学的世界精神	284

——为“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计划”之成立而写

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	289
--------------------	-----

——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

全球化与大学教育的国际维度	296
---------------------	-----

——贺逢甲大学创校四十周年校庆

在世纪之交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	300
----------------------	-----

附录

世纪回眸:从香港文化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317
-----------------------------	-----

——侯军对金耀基教授访谈录

主要著作目录	356
--------------	-----

中国的现代化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必须追溯到百年前的鸦片战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一种“外发的压力”，我们用布莱克(C. E. Black)的术语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卫的现代化”。^[1]前面说过，中国在过去二千年中从没有发生过“全部的”、“永久性”的变迁，而只有“适应性的”、“循环的”变迁，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在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汤恩培

称中国为隐士王国。^[2]但此一“自足的系统”与“隐士王国”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却被一层层地打破了。中国这次所遭遇到的对手是“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西方国家,是中国文化向所未有的劲敌,与从前所遇到的“蛮夷”在文化的“力量”上不止有“程度”之别,亦且有“性质”之异。所以同光年间洞识世务,目光犀利的郭嵩焘指出,西洋人之入中国是天地的一大变。李鸿章、严复也说这是三千年来中国的大变局,是秦以来所未有过的世变。^[3]

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实则上,则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的确,这不止是一国族兴亡的问题,也是一文化绝续的问题。所以,面对着这种巨变与“挑战”,当时掌有国族命脉与文化机运的知识分子(以官僚集团与士大夫集团为主)乃不能不有所“回应”,他们的回应的“幅度”与“深度”是颇不一致的。但在基本上则已自愿或不自愿地承认中国文化之“不足”,以及西方文化之有“胜于”中国者。基于这样一种心态的转变,“现代化”的工作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我们曾经说过,现代化是指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而此形变乃在减少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或技术的差距。^[4]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向来是具有“华夏第一”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根据创此观念的 Sumner 的看法,任何民族都难免于此);也即一切是“中国中心”的,凡是“中国”的都必然胜于“非中国”的,所以,中国是天地之“中”,而环绕于“中”土的皆蛮夷戎狄。中国这种“中”(以中国为中)的观念之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与世界高级文化不相往来的“孤立”状态,而在“历史上”中国又恰巧为低度的文化所包围。在两千年中,中国始终是“文化的输出”者,或“文化的出超”者(历史上只有一度发生印度佛教大规模的输入);那时,中国的确

是有理由唯我独尊的,也确拥有“万国衣冠拜冕琉”的“天朝的荣光”。于是而形成一种华夏至上、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5]但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中”的世界观遭到了挑战。从前促使中国享有“光荣孤立”的“地理的”条件已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消失;从前所环绕于中国的“低度的文化”所形成的“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的“历史的”条件也已不复存在。所以,中国的“变”是迟早的事,是无可避免的事。最基本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已使整个世界的物理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数千年来所有的“天下”观念已成为一幻构。

但不幸的是,中国的变是在西方的炮舰的威胁与轰击下被逼出来的。曾、左、李、胡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就是完全在“口服心不服”的精神状态下发动与进行的。而自强运动、维新运动一连串的“反应”虽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但也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识与短视,当然,一个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容易了解西方文化的。中西这两个文化的“取向”是如此的不同,二者见面之不易“以心会心”实毋宁是必然之事,更何况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所遭遇到的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变态或病态的面向(西方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非西方文化的常态或全面),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无法从正面去了解或欣赏西方文化。但是,鸦片战争后一连串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失败,逼得中国非继续地“变”不可,特别是中日甲午一战后,有眼光与卓见的知识分子更惊觉到中国文化本身的大缺陷,更深一层地知道非以西方致强之道以拯救、改造中国不可,于是,在政治上、军事上乃有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而在文化思想上乃有胡适之等诸先生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但是,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动理现象,却是异常复杂的,这需要从文化人类学上的本土运动的观念加以说明。

二、中国现代化与本土运动

百年来,中国的变是多方面的,多面目的。是步调不一致的,思想不协调的。

要了解中国这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动理现象最好从人类学者所提出的本土运动的观念加以说明。所谓本土运动,依创造这个观念的人类学者林顿(R. Linton)所下的定义,是指两个文化接触之时,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员(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组织的行动,总言之,本土运动即是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下而引起之重整反应。重整反应的本土运动,依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巫术性的,一种是理性的。所谓巫术性的本土运动,是受到客位文化压力的主位文化企图利用巫术或其他超自然的手段以重整其传统文化。所谓理性的本土运动,则是主位文化以理性的观点吸收客位文化的因素以重整传统文化。而这两种本土运动,由于皆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即有的只是企图保存现有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存续的;有的则是尽力想恢复过去的,也就是复古的。准此,林顿又把本土运动分为下述四种:(一)巫术性的复古(revivalistic-magical), (二)理性的复古(revivalistic-rational), (三)巫术性的存续(perpetua-tive-magical), (四)理性的存续(perpetuative-rational)。林顿的本土运动的观念与分类,无疑给予我们研究文化动理现象一个极好的分析架构;不过,林顿的分类后来又经宾州大学的华莱士(A. Wallace)的扩大与补足,他以本土运动中不同的认同对象,而使本土运动这一概念可以包括更多的相关现象。他认为本土运动认同对象的种类可分为三种,即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乌托邦”式的理想文化。这就是说在本土运动中,

有的社会重整反应的目标是过去的传统文化,这一种可包括林顿所说的存续和复古两项;有的则取某一外来文化为重整的方向;有的既不以传统文化为目标也不取某一外来文化,而是以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文化为重整目标。李亦园先生以为将华莱士的三种认同类别,配上前述林顿巫术的与理性的二标准,则又可建立另一本土运动的类型如下:

(一) 以传统文化为重整目标

(1) 巫术的:鬼舞(Ghost dance),如义和团运动属之。

(2) 理性的:康有为的保皇运动属之。

(二) 以外来文化为重整方向

(1) 巫术的:新几内亚的“船货运动”(Cargo Cult)属之。因所谓 Cargo 是白人的船货;新几内亚土人企图以巫术的方式获得白人的 Cargo。太平天国运动在本质上也应属于此类。

(2) 理性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五四运动均属此类。

(三) 乌托邦目标

(1) 巫术的:如古埃及及恩克纳顿一神教(Ikhnaton Monotheistic Cult)运动属之。

(2) 理性的:暂难举出适当例子。^[6]

我以为,这六个类型很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作的重整反应的现象。它使我们了解义和团运动,康有为的保皇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性质与况位。同时,也多多少少可以让我们明白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动力和阻力。不过,在实际上,李亦园先生的分析(或者说林顿与华莱士的分析)似乎还不够周延,它还不能充分说明中

国百年来的文化动理现象,现在我愿意再进一步加以说明。

首先,我认为林肯把重整反应的本土运动只分为巫术的与理性的两种是不够的,因为在巫术的与理性的之间,至少还可以有一种既非巫术的亦非理性的;无以名之,或可称之为情绪的(emotional)。我所谓巫术的是指借超自然力为基础的,既不讲“应不应”,也不问“能不能”。而所谓“情绪”的,是指形上的,意愿的,只讲“应不应”,而不问“能不能”。至于所谓“理性的”,是指科学的,经验的,不只讲“应不应”,也问“能不能”。

其次,我觉得华莱士以本土运动中不同的“认同对象”分析,而将本土运动分为以(一)传统文化为重整目标,(二)以外来文化为重整方向,(三)以乌托邦为目标三种,亦嫌不足以解析过渡时期的中国的文化动理现象。据我个人的观察。以大量现象来看,中国现代文化分子的本土运动的重整目标除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乌托邦之外,至少还应增加“世界文化”一种,因为,现在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在追求一种高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层次的综合。此与乌托邦有基本的不同,这也是纯正的现代化运动的主题。准此,我们可建立起一个中国的本土运动的类型如下。

(一) 以传统文化为重整目标

(1)巫术的:如义和团运动属之。

(2)情绪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及今日的国粹的保守运动等属之。

(3)理性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

(二) 以外来文化为重整目标

(1)巫术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

(2)情绪的:全盘西化论属之。^[7]

(3)理性的:五四运动的主流属之。

(三) 以乌托邦为重整目标

(1)巫术的:民间的轩辕教运动属之。

(2)情绪的:一切企图综合中外文化所有之“精华”者属之
(此为经验之不可能)。

(3)理性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

(四) 以世界文化为重整目标

(1)巫术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

(2)情绪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

(3)理性的:一切企图将中外文化整摄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者属之(以经验的可能性为基础)。孙中山先生、胡适先生等的努力皆属此范畴。

如果我们前面的分类不算大错,则我们再进一步可从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与阻力的角度加以分析,以将它们分别纳入现代化、非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三个范畴中去。

(一)反现代化的:以性质言,凡是巫术的均属之,以认同之对象言,凡是以传统文化(此指毫无选择地,一塌括之地迷古)为重整目标者属之。

(二)非现代化的:以性质言,凡是情绪的均属之。以认同之对象言,凡是以乌托邦为重整目标者均属之。

(三)现代化的:以性质言,凡理性的均属之。以认同之对象言,凡是以世界文化或中西文化之综合为重整目标者属之。

从上面这三个范畴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结论,即百年来,反现代化运动的势力在中国本土运动中占有极大比重,而一些看来是为现代化努力的运动,实际上是“非现代化运动”,

则与中国的现代化虽不见得有大害,但至少是不相干的。至于真正现代化的力量则是十分单薄的。由此,我们也不难了解何以中国的现代化嚷得这么响、这么久,但实际的成绩却是可怜得很。

三、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次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的实际上的动态。

中国现代化运动,本质上,是一文化的与社会的变迁。也可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

中国文化的“形变之链”的过程是契合于汤恩培所创的“文化的反射律”的说的。^[8]我依其说法,加以推衍,中国的现代化大致说来是循着下面三个层次而变的。^[9]

第一,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的现代化。

第二,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的现代化。

第三,思想行为层次(behavioral level)的现代化。

兹就此三层次之变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 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立刻就形成一全面的抗拒的阵线;而第一道被西方文化冲破的便是最外层的器物技术的一道防线。这即是张之洞所说的西学为“用”的“用”,其最明显的就是曾左洋务运动提倡学习西方的“炮利船坚”;因为,这在当时文化意识上,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化之高于中国者在此而不在彼。在政治情势的紧迫上,是中国政治人物认为唯一可免于亡国的道路(即魏默深所谓“师夷之长以制

夷”),汤恩培在《远东与西方》一书观察中日两国对西方的反应中说:

“当十九世纪之际,远东的政治家似认为采取显著优越的西方技术是一合理的冒险与迫切的需要。此足以表示,为何他们从西方选择一些他们并不感到有何兴趣的事物。因为,这比之被西方人征服及臣属,无论如何是一‘较少的罪恶’。”^[10]

所以曾左李胡的洋务运动,便以“开铁矿、制船炮”为第一要务。其实,这是任何“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挑战的第一层反应。我曾从人类学与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中指出,文化中物质因素之转变较非物质因素为快,^[11]在这里也得到证明。至于汤恩培的“文化的反射律”中所指出者于此尤可印证,因为器物技术是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光线”的一支。因为它并不侵害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内部价值。从而所受的阻力最小,所以它对中国文化社会的“穿透力”远较西方的宗教、民主等为大,是以,它是突破中国文化价值防线为西方文化开路的先锋。的确,在中西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器物技术的转变是最先的,这不只是洋枪取代了中国的大刀,洋船取代了中国的舢板,在中国都市与乡村,我们更可发现电灯取代了油灯,汽车取代了人力车,机器取代了大水牛……在某个意义上,经济发展代表的是器物技术的转变,所以经济的现代化总是比政治与思想的现代化为早而顺利的。

(二) 制度层次的现代化

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较之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又深了一层,也难了一层。这道理是不难说明的。因为制度较之器物之影响人的内部价值者为大;故所遇的阻力也越大。因为,它已不是西学之“用”,而是西学之“体”。一旦西学之“体”与中

学之“体”碰头时，麻烦就发生了，因为“用”只触及文化的表层，“体”却触及文化之内层。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行程中，制度的现代化是较器物技能的现代化落后一步的。曾左李胡这一辈知识分子，虽然是时代的先觉者，但他们的识见也只能限于器物技能的现代化上，蒋廷黻先生说：

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的基础。但是他们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处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12]

中国制度上的现代化到了康梁的维新运动才算开始，而真正大规模的改革则等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执政才得展开。维新运动“变法”的努力在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及政府组织制度的革新。光绪皇帝、康梁师生为中心的维新集团所推动的事务虽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运动，他们所主张的废八股、设学校、开办银行、鼓励创办报纸等，确比曾左李胡所做的更“切中要害”，更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这一层改革却触及了中国传统生活的里层，所以自然地遭遇到了文化上的抵抗，而这种“文化上”的抵抗，更密切地与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旧派势力的“利害上”的抵抗相结合，因为这一改革必将使旧派人物丢饭碗、掉官帽，从而，新旧的对抗形成了荣辱生死之争，结果，六君子遇难了，光绪被囚禁了，康梁也飘然远走，这一幕维新运动终以悲剧收场。但是康梁的失败，却造成了一个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孙中山先生革命可说是承继了康梁的现代化精神而向前跨进了一步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亘古以来制度上最彻底的变革，这一制度把整个传统结构